



勤俭持家久 恩泽继世长

母亲常讲，她小时候，个头刚够着灶台，就开始踩着凳子刷锅洗碗了。

穷人的孩子早当家。母亲兄弟姊妹三个，只有她一个女孩子。姥姥身体不好，她打小就挑起了剥菜喂猪、洗衣做饭的家务担子。

嫁给父亲后，因为家口多，底薄，日子过得依然贫困。虽说后来自己盖了房子，但家里像样的东西很少，衣服老大穿完老二穿，缝缝补补穿了一季又一季，被褥也常常一套铺盖盖到底。尽管这样，我家亲戚逢年过节，都愿意到我们这里小住。除了父母热情好客外，母亲的爱干净占了大头。母亲说，做人要有体面，再穷也得干干净净。村北那弯弯曲曲的小河，是母亲最常光顾的地方。记忆中，数九寒冬，北风凛冽，积雪堆满了沟渠，母亲放下担子，随身坐在那寒冷的滩石上，撸起袖子用力砸开厚厚的冰层，双手毫无畏惧地伸入河水之中。她常常一早就过去，一洗洗到晌午头，那寒彻骨髓的河水，连钢铁都要挂上一层霜，不知是她如何忍受的！那天家里忽然来了客人，嫂嫂忙着烧柴点火，洗菜做饭，我跑到河边找寻母亲，眼见的是她发紫的脸颊，触摸的是她冰冷的双手……

母亲是个粗人，不善女工，但脏活累活从不打怵，常常是扔下扫帚就拾起锨，正经地坐下来休息的时候不多。自家的地块在哪里，庄稼长势如何，她都了然于胸。前些年，机械耕种设备尚未普及，栽种时，她人似“牲口”般的拉犁、翻地、播种、铺膜；田间管理时，她疏苗、除草、施肥、洒药，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；收获时，她手割镰刀、肩挑背扛，每一粒粮食都饱含着她辛苦的汗水。年轻时我曾跟随父母收割过小麦，六月时节，骄阳似火，200多米长的田垄一眼望不到边，在地里压得气都透不过来。为了抢收，母亲从凌晨三四点一直蹲到晚上七八点，回来还要抓紧时间脱粒晾晒，一直忙到半夜。这近半个月的夏收抢种，可不是一般的体力所能承受的！

母亲虽不懂算术，但过日子掰着指头算得很清楚。记得我小的时候，一家五口分不到多少粮食，白面主要留着逢年过节、红白喜事用。母亲总是能省则省，把仅有的一点粮食用在刀刃上，就连除夕之夜，包的也是黑白面两样的饺子，白面留给我们，她自己吃黑面的。一年下来，家里竟然还能剩下三五十斤小麦，有时还能接济下别人，我们兄弟姐妹都纳闷，这是怎么省下来的！

前几年夏天，母亲腿痛得厉害，被父亲撵来了医院。检查发现，她的膝盖损伤异常严重，半月板薄得不能再薄，有的地方已不复存在，还有关节囊肿，韧带发炎。医生建议她不要再干农活，抓紧卧床休息。可没过多久，我们趁着午间回去送吃的东西时才发现，娘又下地去了。我们心急火燎地寻到村东口，远远望去，好像有一人在干活，走近一看，可不正是白发苍苍的老娘吗？她挎着一个大篓子，正双膝跪地用力薅草呢……

这几年各方面条件都好了，母亲也上年纪了，每次回去我们都劝她把土地送给别人，自己留点口粮田，种点瓜果蔬菜，够吃就可以。母亲却总是搪塞着，说明年就不种了，但土地的数量总不见少，去年是六七亩，今年说是八九亩，一直没给个准数。邻居们说，老两口真能干啊，少说种了十来亩。去年秋天，阴雨连绵，父亲种的两亩花生刨回家后，二爹、本村表姑和邻居们都过来帮忙摘花生果。看着来了的一大帮子人，母亲十分过意不去，虽然病情严重，站起来都困难，但她依然斜着身子和大家一起摘，怎么劝都不离开！

2018年夏，母亲病重入住烟台毓璜顶医院，手术摘除了子宫及附件；2020年春，长期劳作加上骨质疏松，她的脊椎断裂了三处，做了“骨水泥”手术；2021年初，她的肠胃异常被查出了甲亢；2022年底，她感染新冠昏迷入院，腹部出现不明巨大肿物。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治疗，母亲的身体几乎被掏空了。但疾病没有改变她忙里忙外的性格，只要能下得了炕，她总忙这忙那。父亲经常说“你妈很‘皮实’，吃的药比饭都多”，母亲却说，这要换别人，早就见阎王了！

母亲就是这样一个人，没有做过惊天动地的大事，没有豪言壮语，勤劳、本分、朴实、无华，但这讷于言而敏于行的可贵品质却凝聚成一种精神力量，激励着子孙后代奋勇向前！

征稿启事

本报征集优秀散文、书评。要求角度新颖、笔触独特、贴近当代读者审美和品位。

本报已采用银行转账方式发放稿费，作者投稿时请在文后附注本人银行开户行名称及账号信息。

投稿邮箱：ytrbzkb@126.com

哲理小簿

□张铁鹰

世间无似此泉甘

大明建立，朱元璋“刑用重典”，还提出了一个“守井论”。他常以水井为喻，教臣子清廉为官。他说：“俸禄虽低，却如水井，水虽不满，却如泉涌，可以天天汲取；若贪赃枉法，东窗事发，家破人亡，所贪钱财又有何用？”由是，明初许多州、府衙门院内的水井旁，都立有一块石碑，上刻一警字。

起初，我一直以为“守井论”，是朱元璋的发明。可待读了范仲淹的《会稽清白堂记》，便明白朱元璋的“守井论”，是受了范仲淹思想的启发。范仲淹《会稽清白堂记》道：“会稽府署，据卧龙山之南足……岩之下有地方数丈，密蔓深丛，莽然就荒。一日命役徒芟而辟之，中获废井……乃扃而澄之，三日而后汲。视其泉，清而白色，味之甚甘。”

范仲淹于宋仁宗宝元元年（1038年）十一月至康定元年（1040年）三月，在越州任职（今浙江绍兴）。一日，他出署西行散步，发现山坡下似有泉水。于是命人铲除杂草，又将淤泥乱石清理干净，一股清泉流出，掬之入口，清凉甘美。后来，此泉被当地人称为“清白泉”。

泉水离范仲淹的府署不远，饮得多了，他从中品出了趣味，喝出了警示。炎夏之时，“饮之若饵白雪，咀轻冰，凜如也”；严冬之节，饮之“若遇爱日，得阳春，温如也”。受此泉启发，范仲淹得出结论，“其清白而有德义，可为官师之规”。也就是说，在他看来，这清白的泉水是一面镜子，一个人，特别是一个官员，对其自照，会时常保持清醒。为自励，范仲淹还把自己办公的地方，命名为“清白堂”，并让人“构亭于其侧，曰清白亭”，以示后人。六年后，范仲淹作《岳阳楼记》，写下了“居庙堂之高，则忧其民；处江湖之远，则忧其君”的人生担当，发出了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政治追求。

吴隐之上任后，廉洁奉公，清廉勤恳，所食不过稻米、蔬菜和干鱼，所穿尽是粗布麻衣。离任广州、乘船返乡时，他身无长物，与前几任刺史的“船载珍宝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
范仲淹通过清白泉告诫为政者，治政如同理井，好好治理，就会清流不断；吴隐之用行动表明，泉水没有“贪”“廉”之分，关键是饮者要守住初心。

被宋孝宗赞为“南宋无双士，东都第一臣”的王十朋，一入仕即签判绍兴。他敬仰吴隐之的清白之风，视范仲淹为自己的从政楷模，为表心迹，作《清白泉》诗：

圣人达节犹憎盗，志士清心肯饮贪。

试问卧龙山下酌，世间无似此泉甘。



心香一瓣

□姜 鸿

光阴里日渐清晰的身影

姥姥与我离别40多年了，可是她的身影不仅没有被光阴的大流淹没，反而在我心中越来越清晰。

姥姥是一个裹着小脚的农村妇女，她夏天的样子在我心中格外清晰。她总是穿着白色的府绸斜襟上衣，同样布料盘成的纽扣一丝不苟地扣好，直至领口处。黑色的棉布裤子打着绑腿，也是一丝不苟。脚上是白色棉布袜子，黑色的特制布鞋。今天想来，姥姥这一身打扮，是那样得体，甚至有着穿越了40年光阴的时尚。可当年，只是感觉姥姥干净，她的发髻总是很光滑整齐地梳在脑后，让人看着就感到心里很舒服。

当如今的我被夏天的热浪袭击得丢盔卸甲、狼狈不堪的时候，姥姥的样子就会浮现在眼前。她面容白皙沉静，不紧不慢地给年幼的我摇着扇子。那一缕清风直拂进我的灵魂，永久地给我的生命带来清凉。那是一种带着春风的微微和煦而又带着秋风的微微清风，徐徐拂在我身上，我感受到了姥姥无尽的爱意。姥姥的扇子扇得很轻柔，扇得很有节奏，她一下一下地摇着，驱走了夏日的燥热，也驱走了夏日的蚊虫，我在姥姥的臂弯里安然入眠，姥姥也悄悄地睡着了。夏夜深深的天幕上，明亮的星子在闪烁。

多年之后的今天，这一幅恬静温馨的人间夏夜图卷在我的心中日渐清晰。我频频回望，深深体味。那是我生命里最为安宁的夏天了。内心笃定宁静的人才能摇出那样舒缓有致的扇子的节奏吧？可是姥姥的一生经历了战火，经历了时代的大变迁，更经历了个人生活的起伏动荡。我的姥爷当年闯关东带回了一些银元，置办了一些田地。当生活不再拮据的时候，姥爷的结发妻子却病逝了，留下了一个女儿。姥姥嫁过来之后，接连生了二男三女，可是她始终视那个并非自己亲生的女儿如同己出。大姨和姥姥的感情比和亲爹的还要好。她有什么事情都是跟姥姥说，脾气大的时候，姥姥把家里唯一的楠木箱子陪送给了她。大姨出嫁之后，逢年过节总要回娘家看望姥姥，她和同父异母的弟弟妹妹们也很亲近，直至姥爷去世之后，这种亲情关系仍然没有丝毫改变。

姥姥是菩萨心肠，对谁都很好。当年姥姥家里田地多的时候，农忙时节要雇短工帮忙。每逢这时，家里好的饭食，姥姥是不舍得给家人吃的，要送给地里的短工吃，因为他们干活辛苦。那时候村里人流行着一首顺口溜：“圈里有个猪，栏里有头驴，吃着饼子就着鱼。”这就是他们理想的生活。麦收时节，姥姥就给家里的短工吃玉米饼子和咸鱼，还给他们喝小米粥。姥姥对街坊邻居们也很好。夏秋季节，姥姥去菜园子

里摘豆角，豆角长得多，姥姥总是满载而归，可是等到走到家，常常就是一个空篓子了。那满满一篓子豆角常常全分给街上的邻居们了。姥姥还常常帮助西邻看孩子，好让大人去干活。姥姥在村里是有着好人缘与好口碑的。

姥爷在我母亲几岁的时候便去世了，那时候家里最大的男孩子大舅也才十几岁，姥姥拉扯着一大家子人。

生活，实属不易。后来，连天的炮火打破了姥姥家平静的田园生活，日子日趋艰难，但姥姥一直坚强地在飘摇的风雨中站立，保持着做人的骨气与尊严。但是，姥姥作为一个农村妇女，有些事情的确是无能为力的。她对于儿女们的爱，也是爱到无力而无奈了。她只好任由她的儿女们如一把蒲公英的种子，四散天涯。大舅参了军，三姨远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，母亲考上了中学去县城读书……放手，也是一种爱吧，当我有了孩子，我反复回味姥姥对儿女们的爱，从中感受到一种生活的广博与深厚，也感受到姥姥胸襟的豁达。

母亲病重的那几年，姥姥来我家住过一段时间，帮助母亲操持家务，照料一双儿女。姥姥的一条腿在老家时被凳子打断过，伤好之后就落下了残疾，平常要拄拐棍。做饭忙起来的时候，顾不上拄拐棍，她就瘸着一条腿忙前忙后。时隔40多年，我依然清楚地记得我们租住的民房的那个灶间，傍晚的时候，姥姥瘸着一条腿的背影缭绕在烟气中。父亲在几华里外的高中教书，周末才回家。母亲在村里教书，还没有下班。我和哥哥在灶间玩耍，等待着母亲，也等待着姥姥的饭。这时候，会进来一个中年男人，他手里托着一块豆腐，满脸笑容地对姥姥说：“大娘，吃豆腐吧？”姥姥接过豆腐，一边道谢，一边忙不迭地去拿钱给那个男人。男人收了钱，拿着他的空包袱皮轻松地离开了。这是南村一个推着小车走街串巷卖豆腐的男人，当他把他包袱皮里包裹的最后一块豆腐送给姥姥的时候，也就意味着他一天的劳作结束了，他可以推起他的空小车回家了。

曾经有一段时间，我们是天天晚饭吃豆腐的。吃腻了，我们抱怨过，妈妈也提醒过姥姥，说那是他卖不了的豆腐送到我们家来了，可是无论我们说什么，姥姥总是愉快地接下送来豆腐，然后分毫不差地付钱，再不辞辛苦地起火做豆腐。今天想来，经历过生活的风浪的姥姥，怎会不知道这点儿人情世故，她不过是想与人方便罢了。

至今回味，愈觉姥姥的人生意味隽永。脑海中浮现姥姥与子孙的一张合影，那是一张黑白照片，手牵着孙子的姥姥，端坐在中间，杏眼如星，从容大气。姥姥是美的，这种美已经长留人间，贻福后世。

谨以此文向天堂中的姥姥遥遥叩拜。

1961年，我考入烟台一中，分在二级二班。

大家通常简称我们班为“二级二”。我们的班主任叫张瑶卿。张老师个子不高，微胖，30多岁，妥妥的老师样。张老师的爱人曾在部队工作，家里大人小孩及所有家务事，全指望她一个人。在我们升入初中的第二年，张老师怀孕了，妊娠反应很厉害，她从未请过一天假。长期站立导致她下肢浮肿，但她依然像个没事人一样，站在三尺讲台上。孩子哺乳时期，也是我们初中升高中的关键时刻，那些天，她一天不落地陪在学生们身边，挤不出时间给孩子喂奶是常有的事。

直至现在，我仍很难准确界定她的性格。说她平易近人吧，她的外表又多多少少给人一种矜持甚至严肃的感觉；说她心地善良吧，她批评起人来毫不留情，而且语速快，大道理一套一套的，逻辑性也很强。然而，大家并没有因她的说教式批评而反感。她越这样，大家与她越亲近。有一次，我因为上课看小说，被她说了几句。伤了自尊的我非但没生气，反而有种心服口服之感。现在想起来，唯一的解释是张老师的人格魅力所致。班主任的职责，使她深刻理解“为师者，人魂之匠也”，以及“师者如光，微以致远”的涵义。她就像一块磁铁，对我们这些正处于青春期的孩子，产生了巨大的磁力和虹吸效应。我们参加工作后能走正道，与张老师当年的严格批评教育有很大关系。她是中学时代对我们影响最大的人。

后来，张老师随转业的丈夫去了西安。直至去世前，她与每个同学都保持电话联系。虽然她已经年迈，但在电话中，她对每个同学姓名甚名谁十分清楚，能一口喊出他们的名字，语气中的沉稳与坚定，依然给人温暖与力量。

邹国辅是我们的语文老师。他四方脸，头发卷曲，身材笔挺，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。邹老师知识渊博，教学方法灵活多样。他的课不是一味地照本宣科，而是先介绍一下当时的时代背景，及一些与课文有关的人文故事。邹老师磁性的声音极具穿透力。他在讲古诗词时，不是读，是用抑扬顿挫的语调进行吟诵，这种别开生面的教学，既充满诗画的韵味，也令课堂气氛十分活跃。另外，他还把同学写得较好的文章，当成范文在全班朗读，这一切，都在潜移默化中增加了大家对语文的兴趣。我至今仍酷爱文学，也喜欢写点东西，与邹老师不无关系，他也是对我们影响较大的老师之一。

我们的物理老师叫张春衡，他是所城后裔。有一次物理考试，我是全班唯一一个得满分的人。张老师在课堂上说：“看看人家潘云强，考了一百分，大家应该向他学习。”正是这句看似无心的话，激发了我对物理的热爱。我至今仍保持对电子产品及技术的关注，多少与喜欢物理有关。

还有夏德祺老师、孙广木老师、邬炳楚老师、王志燕老师，我们为是他们的学生而自豪。

这里还有个小插曲。有一年，烟台师专有个毕业生分配到我们班当实习老师。他讲课时，一边在黑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“王文生”，一边说：“我的名字简单，十三画。”他说的其他话，做的别的事，我们似乎都忘记了，但这句话，让我们记了他一辈子。他比我们大不了几岁，师生之间相处特别融洽。他实习结束，班里很多人，特别是女同学，都伤心地流下了眼泪。

五年的中学时光转瞬即逝。1966年5月，正当全班同学一心一意准备冲刺高考时，文化大革命来了。当时提倡学生上山下乡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，参军的同学也不少。纪明娥同学身材姣好，从小喜欢舞蹈，她去了济南军区歌舞团，实现了成为一名专业舞蹈演员的梦想。有一年春节，她还到我所在的师演出过。刘志昌同学从小便有军人情结。他偏爱画画，因为这个特长，到部队后被分配到济南军区电影队。他制作幻灯片，出宣传栏，办墙报板报，配合部队军政任务，做了很多文化宣传工作，很快被提拔为干部。而军人家庭出身，一心想参军的庄峰同学没穿上绿军装，后来，她到了济南军区下属的垦利军马场，以另一种方式，为部队建设添砖加瓦。

其他同学，也都毫无例外地找到了自己在社会上的位置。迟双城同学是我们班长，也是班团支部书记，品学兼优。毕业时，我们班一半以上的同学都入了团，与他卓有成效的工作密不可分。他去了烟台五金工业公司，后来成为公司的一名领导。季德君、赵建国、朱红等同学在烟台港务局就业。那时，港口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日益凸显，然而烟台港生产设备落后，职工文化水平偏低，严重制约着港口发展。因此，港务局在烟台一中、二中等学校，招收了一些老三届毕业生。季德君同学是其中的佼佼者，他在学校时不光学习好，而且多才多艺，会讲故事，会吹笛子、口琴，还会说快板，手风琴也拉得相当不错。后来，季同学担任了港口客运服务公司领导，负责烟台至大连的客货运输及滚装船业务。年轻学生们热情高涨，迅速成为港口的骨干与中坚力量，为改革开放后的港口腾飞埋下伏笔。

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。1978年恢复高考，班里三个早已就业的同学参加了考试。刘维光，这个当年在班里不显山不露水，甚至很难听到她声音的姑娘，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科院粮食研究所当了研究员。张景芬研究生毕业后，在山东大学当老师。林永光研究生毕业后，到了鲁东大学，同样将教书育人当成自己的终身职业。他们向命运发起的二次挑战获大胜。



「二级二」的师生们

□潘云强